

晋楚曾霸,齐鲁燕灭

——周代方伯的发展与演变

黄锦前

(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00)

摘要: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,西周时期的晋、曾、鲁、燕诸国,分别为中原、南土、东土与北土的方伯。以宗法和分封为基础的方伯与核心区互为表里,周王朝通过方伯及核心区,有效地控制各地人力物力资源,发挥其在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,成为王朝在各地的据点和堡垒,以拱卫周室。方伯制的实质,是以武力征服天下,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四方。经过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演变,楚、齐、秦等异姓方伯取代鲁、曾等姬周同姓方伯,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,导致西周瓦解与东周分裂。周代方伯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是鲁、曾等周初方伯渐趋衰亡,晋、楚、齐发展成为新的方伯,又与燕皆为秦所灭,简言之即“晋楚曾霸(伯),齐鲁燕灭”。两周史实即方伯的建立、发展、演变、更替、争斗及消亡史。

关键词:周代;方伯;核心区;宗法制;分封制

中图分类号:K23;K877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9841(2021)01-0207-10

一、序 言

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,千里之内以为御,千里之外设方伯。”^{[1]347-348}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周室衰微,诸侯强并弱,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,政由方伯。”裴骃集解引郑司农曰:“长诸侯为方伯。”^{[2]149}《左传》僖公四年:“五侯九伯,汝实征之,以夹辅周室。”杜预注:“五等诸侯,九州之伯,皆得征讨其罪。”^{[3]329}《汉书·诸侯王表序》:“太公于齐,亦五侯九伯之地。”^{[4]391}

“伯”者,霸也,“方伯”即诸侯之长。《荀子·成相》:“子胥见杀百里徙。穆公任之,强配五伯六卿施。”杨倞注:“伯读曰霸。”^{[5]459}《国语·晋语四》:“(晋文公)遂伐曹卫,出谷戍,释宋围,败楚师于城濮,于是乎遂伯。”^{[6]391}又《齐语》:“唯能用管夷吾、宁戚、隰朋、宾胥无、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。”^{[6]247}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:“昭公元年,晋文公败楚于城濮,而会诸侯践土,朝周,天子使晋称伯。”张守节正义:“(伯)音霸。”^{[2]1495}

文献记载的周代方伯制^[7],结合考古出土材料来看,应可信。但周代究竟有哪些方伯,实行方伯制的原因、作用和影响又是什么,皆值得关注和讨论。

据上引材料,齐、楚、秦、晋是方伯,但《史记》所云应系西周末年的情况,而西周早中期却未必如此,可见方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。要弄清楚这些问题,需对有关材料进行历史的

收稿日期:2020-01-30

作者简介:黄锦前,文学博士,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“绝学”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“新出曾霸铜器铭文与江汉汾涇地区文明进程研究”(19VJX071),项目负责人:黄锦前。

分析。

西周平王东迁以后,历史进入东周。春秋时期,王朝分崩离析,诸侯争霸混战,先后有“春秋五霸”。及至战国,形成七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,史称“战国七雄”。

战国七雄即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等七国,向无异说。再往前追溯,七雄的基础,是春秋五霸,东方的齐国、南方的楚国、西方的秦国,皆系五霸七雄之一,韩、赵、魏三国,系由春秋的霸主晋国分裂而来。燕虽系战国七雄之一,但春秋时期,曾一度萎靡不振,而未能位列霸主。关于春秋五霸,东周时期及去古未远的汉人文献有多种说法,如《吕氏春秋·当务》:“备说非六王五伯。”高诱注:“五伯,齐桓、晋文、宋襄、楚庄、秦穆也。”^{[8]603-606}《荀子·王霸》:“虽在僻陋之国,威动天下,五伯是也……故齐桓、晋文、楚庄、吴阖闾、越勾践,是皆僻陋之国也,威动天下,强殆中国。”^{[5]205}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:“故盛则周、邵相其治,致刑错;衰则五伯扶其弱,与其守。”颜师古注:“伯读曰霸。此五霸谓齐桓、宋襄、晋文、秦穆、吴夫差也。”^{[4]391-392}但无论是哪一种,均未提及燕,表明燕在春秋时期确实已落伍于时代,沦为历史的弃儿。

齐桓、晋文、楚庄等霸主,一般无疑义。秦穆霸西戎,秦人东进以后,承周之余续,励精图治,而成富强,皆系不移之史实。以宋襄为霸主,于情理及史实均不合。吴越作为偏安一隅之国,也不足以称霸中国。虽以蛮夷小邦举兵以临齐晋而霸诸侯,但终究昙花一现,而未成气候。

二、西周的方伯

为巩固统治,周初大规模推行“封建”制,分封宗室,陆续建立一大批诸侯国,作为王朝的屏藩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“昔武王克商,成王定之,选建明德,以蕃屏周。”^{[3]1545}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曰: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,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郕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,文之昭也。邰、晋、应、韩,武之穆也。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,周公之胤也。”^{[3]418-419}周室子孙,星罗棋布,镇守各处要冲。

据文献,周初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鲁、齐、燕、卫、宋、晋等。

(一)北土

北土的燕蓟地区,主要有燕、邢等封国。

燕是召公奭的封国,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:“周武王之灭纣,封召公于北燕。”裴骃集解:“《世本》曰:‘居北燕。’宋忠曰:‘有南燕,故云北燕。’”^{[2]1549}召公在王朝任职,未就封,其长子克系第一代燕侯。

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发掘表明^[16],周初燕被封于今房山一带。西周燕国的铜器在今北京(房山琉璃河、昌平白浮西周墓^[10])、天津(蓟县张家园^[10-12])、河北及辽宁(凌源、喀左^[13-15])等地皆有集中出土,可见当时的燕国,地跨今京津冀辽,是一个幅员广袤的大国,是周王朝在北土的支柱,承担着镇守东北辽阔边疆的重任。

琉璃河墓地出土的大保壘(克壘)^{[16]25图四:1}和大保盃(克盃)^{[17]21}“王曰:‘太保,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。余大对乃享,命克侯于燕,旃、羗、马、馭、零、馭、彭。’克宅燕,入土眾厥司,用作寶尊彝”,“命克侯于燕”,例同沫司土疑簋(康侯簋)^{[18]第7册,4059[17]30}“诞命康侯鄙于卫”、疏公簋^{[19]111-113}“王命唐伯侯于晋”及宜侯矢簋^{[18]第8册,4320[17]118}“王命虞侯矢曰:迁侯于宜”等,即成王命克侯于燕。

据文献,邢系周公子封国,河北邢台葛家庄、南小汪遗址及邢侯墓地^[20-21]考古发掘证实,西周时期邢国在今邢台一带。

燕、邢皆系姬周宗室重臣所封,燕系召公奭封国,更非同寻常。北土的中心,在以今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,燕国是其核心,是自始至终的首领。

(二)东土

在燕蓟的南面,东土的河济邾泗地区,主要封有齐、鲁、滕、奄、宋等国。

齐是姜太公的封国,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及墓地的发掘^[22],表明周初齐始封于此。高青陈庄出土丰簋(M18:6)^{[22][23]33图8:2}、丰卣^{[22]33图8:1}、丰觥(M13:3)^{[24]第24卷,496}“丰肇作厥祖甲宝尊彝”“丰肇作文祖甲齐公尊彝”“丰肇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”的“祖甲(齐公)”,应即第一代齐公姜太公。

鲁是周公旦的封国,同召公一样,周公在王朝任职,未就封,其长子伯禽系第一代鲁侯。禽簋^{[18]第7册,4041[19]108-110}“王伐盖侯,周公谋,禽礼,禽有戾(烈)礼,王锡金百镒,禽用作宝彝”,大祝禽鼎^{[18]第4册,1937-1938[24]第2卷,475-476}“太祝禽鼎”,“禽”“太祝禽”即伯禽,曾在王朝任太祝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“分鲁公以大路、大旂,夏后氏之璜,封父之繁弱,殷民六族,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,使帅其宗氏,辑其分族,将其类丑,以法则周公,用即命于周。是使之职事于鲁,以昭周公之明德。分之土田陪敦,祝、宗、卜、史,备物、典策,官司、彝器;因商奄之民,命以《伯禽》而封于少皞之虚。”杜预注:“伯禽,周公世子。时周公唯遣伯禽之国,故皆以付伯禽。”^{[3]1545-1547}

鲁国在今山东曲阜,史有明文,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(周武王)封弟周公旦于曲阜,曰鲁。”^{[2]127}也已为考古工作所证实^[25]。

东土的齐、鲁、滕、奄、宋等国,除鲁、滕外,余皆为异姓,但齐系姜太公、宋为商纣王子武庚的封国,奄亦系商人后裔,且曾为商都所在(古本《竹书纪年》:“南庚更自庇迁于奄。阳甲即位,居奄。”^{[26]28}即南庚时迁于奄,阳甲时仍“居奄”,直至盘庚迁殷即今河南安阳,殷商一直都奄),因而皆非同寻常。周公东征后,殷商旧部被削弱迁徙。这一地区的中心,在以今滕州曲阜为中心的鲁西南一带,鲁国是其主导者。

(三)中原

河济邾泗以东,是中原河洛汾浍地区,主要有晋、卫、邶、霸、黎(楷)、虞等国。

晋之先曰唐,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“分唐叔以大路、密须之鼓、阙巩、沽洗,怀姓九宗,职官五正。命以《唐诰》而封于夏虚,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。”杜预注:“唐叔,晋之祖。”^{[3]1549-1550}山西曲沃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叔矢方鼎^{[27]9图12}“唯十又四月,王彤、大柶、棗,在成周,咸棗,王呼殷厥士,賚叔矢以裳、衣、车、马、贝卅朋”,“叔矢”即叔虞,“王”系成王。春秋晚期的晋公盂^{[18]第16册,10342[24]第13卷,493-495}、晋公盘^{[28]第3卷,308-312}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,晋公曰:我皇祖唐公,〔膺〕受大命,左右武王,教畏百蛮,广辟四方,至于不廷,莫不及殛。〔王〕命〔唐〕公,建宅京师,君百邑作邦”,系晋公对其先祖唐公叔虞被成王册封于唐之追记。

叔虞子燮父被徙封于晋,据曲沃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考古发掘^[29],其地在今曲沃一带。疏公簋“疏公作妻姚簋,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,唯王廿又八祀”,“唐伯”即燮父,“侯于晋”,即燮父被徙封于晋地,时间是“唯王廿又八祀”,即康王二十八年^[30],《毛诗正义》引郑玄《诗谱》:“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,曰唐侯。南有晋水,至子燮改为晋侯。”孔疏:“《地理志》云:‘唐有晋水,叔虞子燮为晋侯。’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,盖时王命使改之也”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:“唐叔子燮,是为晋侯。”正义:“徐才《宗国都城记》云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,今并理故唐城,唐者,即燮父所徙之处……’。毛诗谱云‘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,改曰晋侯’。”^{[2]1636}与簋铭正合。

卫是文王子康叔的封国,《左传》定公四年:“分康叔以大路、少帛、綍茷、旃旌、大吕,殷民七族,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锜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;封畛土略,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,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,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。聃季授土,陶叔授民,命以《康诰》而封于殷虚。皆启以商政,疆以周索。”杜预注:“康叔,卫之祖。”^{[3]1547-1549}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发掘表明^[31],其地在今浚县一带。

辛村墓地出土的沫司土疑簋(康侯簋)“王来伐商邑,诞命康侯鄙于卫,沫司土疑罍鄙”,“诞命康侯鄙于卫”,即成王封康叔居于卫,《逸周书·作雒篇》:“周公立,相天子……二年,又作师旅,临卫政(征)殷,殷大震溃……凡所征熊盈(嬴)族十有七国,俘维九邑。俘殷献民,迁于九里。俾康叔宇于殷,俾中旄父宇于东。”^{[32]514-520}《尚书大传》云“周公摄政,一年救乱,二年克殷,三年践奄,四年建侯卫”^{[33]262},可知封卫是在成王四年。近年新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楚简《系年》“周成王、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,乃追念夏商之亡由,旁设出宗子,以作周厚屏,乃先建卫叔封于庚(康)丘,以侯殷之余民。卫人自庚(康)丘迁于淇卫^{[34]47-48、144}”,云康叔始封于庚(康)丘,后迁于淇卫^[35],与燮父徙封于晋相似。

河洛汾浍地区的晋、卫、邰、霸、黎(楷)、虞等国,邰、霸虽系异姓,但据近年出土邰^[36-38]、霸^{[39-40]122-163}两国考古资料来看,皆曾盛极一时。卫、黎(楷)、虞皆系姬周同宗所封,地位非同一般,考古出土卫^[31]、黎(楷)^[41-42]、虞^[43]国资料,也可予以印证。在这一地区,从最初分封的战略考虑看,晋国的地位无疑最重要,从西周到东周,晋国及后来一分为三的韩、赵、魏,事实上也一直是该地区的领头羊。因此,晋南运城盆地及中原地区,是以今临汾侯马为中心的晋国为主导。

(四)南土

中原以南,是南土淮域江汉地区,主要有应、曾、鄂、楚、邓、郢、陈、蔡等封国。

应是武王子封国,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:“邰、晋、应、韩,武之穆也。”杜预注:“四国皆武王子。应国在襄阳城父县西南。”^{[3]419}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表明^[44],其故址在今平顶山市。

在应国的南面,又有“汉阳诸姬”^{[3]447},汉阳诸姬之长系随国“汉东之国随为大。”^{[3]174},随即东周铜器铭文中常见的“曾”^[45-46],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^[47-50],揭开了早期曾国的神秘面纱。

将随州文峰塔墓地 M1 出土的曾侯與编钟^[51]“伯适上庸,左右文武,达殷之命,抚定天下。王遣命南公,营宅汭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”与叶家山 M111 出土猗簋(M111:67)^[52]“猗作刺考南公宝尊彝”及陕西岐山出土太保玉戈^{[24]第35卷,373-374[53]彩图1}“六月丙寅,王在丰,命太保省南国,帅汉,诞殷南。命曾侯辟,用鼃走百人”合观,可知曾国系周成王封南公于今随州一带所立,与叶家山考古发现互为印证;册命曾侯者系召公奭,太保玉戈与曾侯與编钟记事可互补;叶家山的曾与传世和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汉东姬姓之“曾”即文献中的“随”实一^[54]。与晋公盂、盘铭一样,钟铭系曾侯與对其先祖南公被封于南土之追记。

“南公”或称“南宫”,又见于叔鼃鼎^{[18]第4册,2342}、大盂鼎^{[18]第5册,2837}、南宫乎钟^{[18]第1册,181}等,系文王子,因其居住宫室称谓而得名。叶家山 M107 出土曾伯爵“曾伯作西宫宝尊彝”^[55]，“西宫”又见于曾大攻尹季怡戈^{[18]第17册,11365}等,指周文王,叶家山 M111 所出太保钺之“太保”即召公奭,与南宫系兄弟,无怪乎曾侯與编钟铭“曾侯與曰:余稷之玄孙”。

所谓“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”,即东南的淮夷国族均在其管理之下,江汉地区统归南公所“临有”^[56]。周初封南公于江汉的初衷,是以曾国作为方伯,统辖镇抚整个南土淮水、江水与汉水之间及其邻近地区的广大地域,“南公”之称,或即与此有关。对淮夷的控制、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,是王朝封南公的两个主要目的,建立曾国,是周初经营南土谋略的关键性环节^[57]。

楚是南土的另一重要封国。叶家山墓地出土的荆子鼎(M2:2)^{[38]17图21}“丁巳,王大佑。戊午,荆子蔑历,敝(赏)白牡一;己未,王赏多邦伯,荆子丽,赏鬯卣、贝二朋”,“荆子”即“楚子”,亦即文献记载的成王时受封的楚王熊绎^[58]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熊绎当周成王之时,举文、武勤劳之后嗣,而封熊绎于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芈氏,居丹阳。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侯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”^{[2]1691-1692}

《国语·郑语》:“当成周者,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。”^{[6]507}南土地区的应、曾、

鄂、楚、邓、郟、蔡等国，应、曾、蔡是姬周同姓，鄂、楚、邓、郟皆为异姓。周文王子南宫，在周初大规模封建背景下被成王册命为曾侯，在今随州一带立国，“君庇淮夷，临有江夏”，作为江汉地区战略防御的核心，与在今河南平顶山一带的应国，以及在今上蔡一带的蔡国，形成犄角之势，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在江汉、淮域战略防御体系的核心，是周王朝在南土的屏障。

南土淮域江汉地区的中心，在今随州枣阳为中心的随枣走廊一带，曾国是其重心。

(五)西土

中原及宗周以西的西土，主要封国有芮、毕、虢等，三者皆系周之同姓。春秋时期芮、虢的地望，据陕西韩城梁带村^[59-61]、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^[62]，以及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^[63]图版伍捌：1、37图34^[64]的考古发掘可知，分别在今陕西韩城、澄城、河南三门峡一带，如《国语·郑语》“当成周者……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”所云，与虞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等国邻近，在今晋西南、陕东南、豫西北即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三省接合部一带。早期芮、虢的地望，据出土铜器等材料，应在西土，与文献如《左传》昭公九年“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骀、芮、岐、毕，吾西土也”^{[3]1267}相合。

芮公簋^{[24]第9卷,183-184}“芮公为祈宫宝簋”、芮伯簋^{[65]100-103}“芮伯作祈公日宝簋”、芮公叔簋^{[66]71,图9,72,页图13-14}“芮公叔作祈宫宝簋”、伯六鼎^{[18]第4册,2337[24]第3卷,448}“伯六作祈宝尊彝”及伯鼎^{[28]第1卷,112}“伯作旂仲日尊鼎”的“祈宫”“祈公”“祈”“旂仲”为同人，即山西翼城大河口M1所出霸簋^{[40]34,35[24]第9卷,355}“芮公舍霸马两、玉、金”的“芮公”，《尚书·顾命》等所记王室大臣“芮伯”，是成康时期首封芮公。芮公叔盘^{[24]第25卷,547-548}“唯十又一月，王至于祈，芮公锡贝百朋，芮嬖锡贝卅朋，芮公叔用作芮少嬖”，“旂(祈)”应系芮都宫室宗庙所在地，“祈宫”“祈公”分别系第一代芮伯庙号和氏称，系以地为氏。《尚书·旅獒》孔传：“芮伯，周同姓，圻内之国”^{[67]331}，结合出土铜器铭文，芮国始封于殷商祈族故地，今陕西扶风一带。

毕是文王子封国。《左传》昭公九年：“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骀、芮、岐、毕，吾西土也。”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：“毕国，在长安县西北。”^{[3]419}吴虎鼎^[68]“厥南疆毕人罍疆”与传世和出土文献可互证，毕的地望在今西安长安区韦曲西北^[69]。

会甗^{[28]第1卷,369}“会作毕公宝尊彝”、史簋^{[18]第7册,4030-4031[70]51}“乙亥，王诰毕公”及献簋^{[18]第9册,4205[24]第11卷,255-256}“献身在毕公家”的“毕公”，应即成康时首任毕公，《尚书》等文献所载之毕公高。毕簋^{[18]第6册,3470[24]第8卷,418}“毕□□会父戊旅簋”与会甗系同人所作，“父戊”应即甗铭的“毕公”。

虢是文王弟虢仲封国，在今陕西宝鸡东，称西虢。又有虢叔所封之东虢，在今河南荥阳一带。平王东迁，西虢徙上阳，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及山西平陆一带，已为考古发掘工作所证实。

西土的芮、毕、虢等皆封于近畿之地，该地区的中心是以今西安宝鸡为中心的宗周岐周，是周人的大本营。

上述众多封国中，有几个重要的典型，如燕、鲁、晋、卫及曾。鲁、卫、晋三国，分别是在东土少皞之墟与商奄、殷墟、夏虚的基础上所建立，以治理东夷、殷商旧部及戎狄；燕是周王朝在北土的支柱，镇守着东北辽阔的边疆；曾则肩负控制淮夷、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的重任。这些核心封国，无一例外，皆系姬周宗亲所封。鲁、燕分别系周公和召公的封国，曾为重臣南公、晋为成王弟叔虞封国，皆位高权重，非同寻常。

据文献及铜器铭文记载，西周王朝在宗周与成周两京地区、重要诸侯国及四土各战略要地，皆设置王师常驻。如西土有驻守在宗周附近的“西六师”（或称“六师”“西师”，见于鼓罍簋^{[18]第7册,4047}、旻戒鼎^{[71]418-419}、吕服余盘^{[18]第16册,10169}、南宫柳鼎^{[18]第5册,2805}、贤鼎^{[28]第1卷,294}、盨尊^{[18]第11册,6013}、盨方彝^{[18]第16册,9899,9900}、禹鼎^{[18]第5册,2833,2834}），中原及成周附近有“成周八师”（或称“八

师”“殷八师”“正八师”“东八师”“东师”，见于小臣𠂤簋^{[18]第8册,4238、4239}、事盥鼎^{[18]第5册,2575}、召卣盖^{[18]第15册,9728}、小克鼎^{[18]第5册,2796-2802}。作册𠂤鼎^{[18]第4册,2504}“康侯在朽(柯)师”，“康侯”应即屡见于铜器铭文和文献的康侯封，“朽”读作“柯”，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的春秋时卫地之柯，“柯师”应系在殷商故地的王师即殷八师驻地^[72]。

东土、南土及中原以北地区，也皆有王师驻守。如东土有“齐师”（师寰簋^{[18]第8册,4313、4314}、引簋^{[28]第11卷,444-446}、总簋（妊小簋）^{[18]第8册,4123}、史密簋^[73]）、南土有“曾鄂师”（静方鼎^[74]、中甗^{[18]第3册,949}），中原晋南一带有“豳师”（趯簋^{[18]第8册,4266}、静簋^{[18]第8册,4273}、善鼎^{[18]第5册,2820}）等。师卫尊、壶^{[24]第21卷,257,第22,322-324}“唯九月既生霸，宫公省仆器于北麦，宫公赏师卫贝五朋”，“北麦”可能在今山西吉县一带，据铭文该地也有王师驻守。北方的燕蓟地区，目前铜器铭文虽未见有明确的相关记载，但循以其他各地之例，也不应例外，否则不足以控制地跨今京津冀辽幅员广袤的北土，镇守东北辽阔的边疆。

这些驻守在两京及中原与四土各要冲等政治中心的王师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基本防御力量。其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大军区，实即一个个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，与燕、鲁、晋、卫及曾等核心封国和中心区互为表里。

经过一番精心的布局和谋划，东土以鲁国为首今滕州、曲阜为中心的河济邾泗地区，南土以曾国为首今随州、枣阳为中心的淮域江汉地区，中原以晋国为首今临汾、侯马为中心的河洛汾浍地区，北土以燕国为首今北京、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，拱卫中间以宗周和成周中心的两京，位于今西安和洛阳的宗周和成周两京，是这一体系的核心，周王朝的统治中枢。

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，是核心封国的文化特征较为明显，表现出强势和持续的影响力，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 and 引领作用。如南土的曾国、东土的鲁国、中原的晋国，以及北土的燕国等，从考古学文化因素来看，相对于本地区的鄂、楚、奄、邶、霸等而言，其主导地位 and 引领作用皆较为明显。

与分封互为表里的，是营建成周洛邑。成周洛邑位于今河南洛阳盆地，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。《逸周书·作雒篇》：“周公立，相天子，三叔及殷、东、徐、奄及熊盈（嬴）以畔（叛）。周公、召公内弭父兄，外抚诸侯。九年夏六月，葬武王于毕。二年，又作师旅，临卫政（征）殷，殷大震溃……凡所征熊盈（嬴）族十有七国，俘维九邑。俘殷献民，迁于九里。俾康叔宇于殷，俾中旄父宇于东。周公敬念于后曰：‘予畏周室克追，俾中天下。’及将致政，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”^{[32]514-525}周人建都丰镐后，又营建成周，“宅兹中国”（何尊^{[18]第11册,6014}），意图非常明显，就是要向东延长政治中心，以弥补镐京偏西、局狭一隅之不足，扼守天下之中，以更有效地控制中原、南土、东土及北土。

成周的营建，使卫国治理殷墟震慑殷商旧部的负担大为减轻，其中原的中心功能和地位皆为成周所弱化，犹如西土邻近宗周岐周的芮、毕、虢等国；卫之于晋，犹南土的应之于曾，是后备，其重要性也随之而降低。因此，卫实非中原的方伯。

上引《楚世家》云“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侯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”，楚人将其先王熊绎与齐、鲁、卫、晋诸侯并列，以示其在周初的荣宠与重要，但燕及曾于此皆未提及，而此二者地位绝不在齐、鲁、卫、晋等之下，不可谓不重要；再者，所云诸国，鲁、卫、晋为姬周同姓，齐及楚皆为异姓，事实显明。因此，楚人之言，实乃借故事以抬高身价，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《楚世家》之文，与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“昔我先王熊绎，与吕伋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并事康王”^{[3]1304}也明显矛盾，乃史迁杂糅有关史实未加细致辨析而致误。

据以上分析，结合文献所云周代的方伯制来看，晋、曾、鲁、燕分别为周代中原、南土、东土与北土的方伯，证据确凿充分，事实清楚明白。

三、东周方伯的更替

周初统治者经精心布局,在中原及四土地区分别建立晋、卫、应、曾、齐、鲁、燕、芮、毕、虢等主要封国,形成以今临汾侯马、随州枣阳、滕州曲阜、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核心区,拱卫宗周和成周,其基本理念是控制中原及四土的中心(核心区),扼守天下之中(两京),以临中国,建立起四点(晋、曾、鲁、燕)一线(两京)、表里山河、合诸夷夏的基本政治地理空间架构,将土地、人口及资源有效结合起来。

晋、曾、鲁、燕等方伯,分别与中原、南土、东土、北土核心区互为表里。周王朝通过四土与中原的方伯及核心区,更有效地控制各地人力、物力资源,以发挥其在各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and 引领作用,成为王朝在各地的据点和堡垒,加强对各地统治,拱卫周室。因此,方伯制是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,与核心区互为表里,方伯制的实质,就是以武力征服天下,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四方。

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,核心区自身力量逐渐强大,其内部的凝聚力也逐步增强,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共同体,自然形成新的首领诸侯国。

北土的燕邢,春秋以后,相对疲软,曾为一方都会、以今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,逐渐丧失其核心地位,同时中心南移至今河北易县一带。

东土地区,鲁国自宣王以后,多次发生废长立幼、杀嫡立庶事件,内斗较甚。鲁桓公、庄公、僖公时,一度与齐国争夺东方的霸主,鲁僖公曾领导诸侯抗衡楚成王与晋文公,之后渐衰。而齐国则逐渐呈上升之势,因而取代鲁国独自成为东土的霸主。齐僖公时,小霸于中国。桓公即位后,任管仲为相,推行改革,逐渐强盛。桓公“尊王攘夷”,“九合诸侯”,成为中原霸主。战国时期齐国继续雄霸一方。

中原的河洛汾浍地区,邰、霸等国在西周早中期曾盛极一时,但终究昙花一现,据考古资料看,至西周晚期以后皆渐趋衰落。卫、黎(楷)、虞等姬姓封国,至西周晚期以后,也渐趋没落,以卫国最为典型。晋国在分封后很长时间内,实力皆算不上强大,地也不过百里。《国语·晋语》云晋国“景霍以为城,而汾、河、涑、浍以为渠,戎、狄之民实环之”^{[6]301},《左传》昭公十五年:“晋居深山,戎狄之与邻,而远于王室。”^{[3]1343}春秋以后,晋国兼并了晋南一带诸邻国,扩地千里,一跃而成为雄霸一方的霸主。

郑国受封较晚,“我周之东迁,晋、郑焉依”^{[3]104}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春秋初年,郑国自西土东迁。郑庄公时,迁至今河南新郑,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,小霸于中国。庄公死后,诸子争权,郑国陷入内乱。

南土的江汉地区,西周早期鄂、曾是周初两个最大的势力集团,分别为姬周异姓和同姓诸侯的代表,楚则相对较弱,成王时鄂曾楚共处汉水中游的今随州、宜城一带,江汉地区鄂曾楚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已基本形成。康王以后,楚人反周,昭王伐楚失败,丧师失地,江汉地区的战略平衡被打破,楚人迫近,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退缩,防线有所收缩,西周中期曾鄂的政治中心,很可能已迁离故地。楚公逆编钟^{[75]98-103}“欽融内(纳)(飨)赤金九万钧”,“金”即铜,铭文表明此时楚国对南土的铜等战略资源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。厉王时鄂侯驭方叛周,被王师翦灭,江汉地区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,曾国独自抗楚。春秋以降,楚人急剧崛起,而曾人日益衰弱。楚武王时,楚人“不得志于汉东”^{[3]174},楚成王以后,“随世服于楚,不通中国”^{[3]1608},彻底沦为楚之附庸,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,楚国成为该地区的霸主。春秋中期以后,楚人逐渐北上东进,开疆拓土,处于中原和南土之间的应国,春秋早中期之际,也被楚国北上攻灭,南土尽入楚人彀中,形势发生了翻

天覆地的变化。至楚庄王时,饮马黄河,北祀泰山,成为一霸。及至战国,楚仍是雄踞南方的霸主,跃跃欲试。

西土地区,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和东迁,芮、虢等国也先后东迁,关中地区逐渐空虚,日益凋敝,秦人乘虚而入。秦系西戎,不通中国,至秦穆公时,“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”。至于战国,秦仍雄霸一方,最后竟一统六国。

总之,经过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演变,鲁、曾等姬周同姓方伯皆被淘汰,异姓的楚、齐、秦,逐渐成长为新的方伯,郑国小霸,昙花一现,加上旧有的晋,而成春秋五霸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:“晋阻三河,齐负东海,楚介江淮,秦因雍州之固,四海迭兴,更为伯主,文武所褒大封,皆威而服焉。”^{[2]509}

自周初形成的以两京为中心,中原及四土核心区为次中心的权力结构模式,逐渐分离瓦解,形成核心区诸侯坐大、中心萎缩凋零的局面,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力日渐削弱。王室衰微,平王被迫东迁,诸侯国实力进一步上升,逐渐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周室衰微,诸侯强并弱,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,政由方伯。”总之,方伯的更替,标志着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,直接导致西周的瓦解与东周的分裂。

战国时期,一个重要的变化,就是方伯先后称王。楚国因是异姓,称王最早,楚武王时即称王;秦惠文王、齐威王、燕易王等,也纷纷称王;三家分晋后,韩、赵、魏也先后称王。

方伯的更替及权力结构的变化,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明确体现,如南土地区,春秋中晚期以后,随着楚人崛起并向四周扩张,楚文化逐渐取代以曾人为代表的周文化,成为南方地区的主流文化,楚人在融合南土各种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基础上,发展演变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。东周时期,以西周的中原及四土核心区为基础,逐渐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中原(晋)文化、楚文化、齐鲁文化、燕文化、秦文化。

四、结 语

方伯的建立和发展,保障了西周的强盛和安全。方伯更替,西周瓦解。新方伯春秋五霸及战国七雄之间互相争斗拼杀,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长期角力,秦人最终获胜,方伯消亡。两周史实即方伯的建立、发展、演变、更替、争斗及消亡的历史。

综观周代方伯建立及更替的历史,可将其简明形象地概括为“晋楚曾霸(伯),齐鲁灰飞燕灭”,即由周初的四个方伯及核心区(晋、曾、鲁、燕)与宗周岐周演变而成春秋五霸(齐、晋、郑、楚、秦),再成战国七雄(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),再至秦一统。其基本过程即鲁、曾等周初方伯渐趋衰落、消亡,晋、楚及齐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区首领和新的方伯,最终又与燕殊途同归,被后起的秦所灭,简言之,即“晋楚曾霸(伯),齐鲁燕灭”。

总结本文所论,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,西周时期的晋、曾、鲁、燕诸国,分别为中原、南土、东土与北土的方伯。方伯制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,与核心区互为表里,周王朝通过方伯及核心区,有效地控制各地人力物力资源,发挥其在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,成为王朝在各地的据点和堡垒,以加强对各地统治,拱卫周室。方伯制的实质,是以武力征服天下,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四方。经过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演变,楚、齐、秦等异姓方伯取代鲁、曾等姬周同姓方伯,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,导致西周的瓦解与东周的分裂,东周时期先后争霸称雄的春秋五霸及战国七雄,系以西周方伯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。周代方伯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是鲁、曾等周初方伯渐趋衰亡,晋、楚、齐发展成为新的方伯,又与燕皆为秦所灭,简言之即“晋楚曾霸,齐鲁燕灭”。两周史实即方伯的建立、发展、演变、更替、争斗及消亡史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孔颖达. 礼记正义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2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3] 孔颖达. 春秋左传正义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4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5] 王先谦. 荀子集解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6] 左丘明. 国语[M].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,校点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
- [7] 王健.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[M].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4.
- [8] 陈奇猷. 吕氏春秋新校释[M]. 北京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9]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.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(1973—1997)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5.
- [10]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.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——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[J]. 考古,1976(4):246-258.
- [11]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. 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[G]//文物编辑委员会. 文物资料丛刊:第1辑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77:163-171.
- [12]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. 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[J]. 考古,1984(8):698-705.
- [13]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. 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[J]. 文物参考资料,1955(8):16-27.
- [14] 辽宁省博物馆,朝阳地区博物馆.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[J]. 考古,1973(4):225-226+257+270-271.
- [15] 喀左县文化馆,朝阳地区博物馆,辽宁省博物馆,北洞文物发掘小组.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[J]. 考古,1974(6):364-372.
- [16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. 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[J]. 考古,1990(1):20-31.
- [17]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.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:第6卷[G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7.
- [18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. 殷周金文集成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4-1994.
- [19] 中国国家博物馆,中国书法家协会.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文粹[G]. 合肥:安徽美术出版社,2015.
- [20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邢台商周遗址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1.
- [21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,邢台市文物管理处. 河北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发掘简报[J]. 文物,2012(1):4-18.
- [22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[J]. 考古,2010(8):27-34.
- [23] 孙敬明. 陈庄金文卜辞小笺[N]. 中国文物报,2010.4.2(7).
- [24] 吴镇烽.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[G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
- [25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 曲阜鲁国故城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1982.
- [26] 方诗铭,王修龄.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 2005.
- [27] 李伯谦. 叔矢方鼎铭文考释[N]. 文物,2001(8):39-42.
- [28] 吴镇烽.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[G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.
- [29]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,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 天马——曲村(1980—1989)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0.
- [30] 李学勤. 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[M]//李学勤. 通向文明之路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0:112-117.
- [31] 郭宝钧. 浚县辛村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64.
- [32] 黄怀信,张懋镕,田旭东. 逸周书汇校集注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- [33] 皮锡瑞. 尚书大传疏证[M]//皮锡瑞全集,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
- [34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.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:2[G]. 上海:中西书局,2011.
- [35] 李学勤. 清华简《系年》及有关古史问题[J]. 文物,2011(3):70-74.
- [36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,运城市文物工作站,绛县文化局.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[J]. 考古,2006(7):16-21.
- [37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,运城市文物工作站,绛县文化局.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[J]. 文物,2006(8):4-18.
- [38] 深圳博物馆,山西博物院,山西省考古研究所. 晋国霸业——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图录[G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8.
- [39]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.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[J]. 考古,2011(7):9-18.
- [40] 深圳博物馆,山西省考古研究所,山西博物院. 封邦建霸——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国文物珍品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6.
- [41] 张崇宁,杨林中. 山西发掘黎城西周墓地[N]. 中国文物报,2007.4.25(2).
- [42] 韩炳华,杨林中,李书勤. 山西长子发现大型西周墓地[N]. 中国文物报,2013.10.25(8).
- [43] 黄锦前. 论吴季大诸器及有关虞国青铜器[G]//陕西历史博物馆.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:第26辑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9:10-20.
- [44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. 平顶山应国墓地 I[M]. 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12.
- [45] 石泉. 古代曾国——随国地望初探[M]//石泉.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. 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88:84-104.
- [46] 李学勤. 曾国之谜[M]//李学勤. 新出青铜器研究. 北京: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6:124-131.
- [47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[J]. 文物,2011(11):4-60.

- [48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[J]. 考古,2012(7):31-52.
- [49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[J]. 江汉考古,2013(3):3-6.
- [50] 湖北省博物馆,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随州叶家山——西周早期曾国墓地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3.
- [51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随州文峰塔 M1(曾侯與墓)、M2 发掘简报[J]. 江汉考古,2014(4):3-51.
- [52] 黄凤春,胡刚. 说西周金文中的“南公”——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[J]. 江汉考古,2014(2):50-56.
- [53] 陈鹏宇. 太保玉戈的出土时代及铭文释读[G]//李学勤. 出土文献:第14辑. 上海:中西书局,2019.
- [54] 黄锦前. 曾侯與编钟铭文读释[J].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,2017(3):76-89.
- [55]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随州市博物馆. 湖北随州叶家山 M107 发掘简报[J]. 江汉考古,2016(3):3-40.
- [56] 李学勤. 曾侯與(與)编钟铭文前半释读[J]. 江汉考古,2014(4):68-69.
- [57] 李学勤. 正月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详解[J]. 中原文化研究,2015(4):16-20.
- [58] 黄锦前. 荆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[J].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,2013(9):62-70.
- [59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震旦艺术博物馆. 芮国金玉选粹——陕西韩城春秋宝藏[M]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7.
- [60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,韩城市文物旅游局. 梁带村芮国墓地: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0.
- [61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上海博物馆. 金玉华年:陕西韩城出土周代文物珍品[M]. 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2012.
- [62]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. 周代封国考古的新发现——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墓地发掘取得重要收获[N]. 中国文物报,2018.1.12(8).
- [63]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. 上村岭虢国墓地[M]. 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59.
- [64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. 三门峡虢国墓:第1卷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9.
- [65] 首阳斋,上海博物馆,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. 首阳吉金——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66] 王锡平,唐禄庭. 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[J]. 文物,1986(8):69-72.
- [67] 孔颖达. 尚书正义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68] 穆晓军. 陕西长安县出土西周吴虎鼎[J]. 考古与文物,1998(3):69-71.
- [69] 王辉. 吴虎鼎铭座谈会纪要[J]. 考古与文物,1998(3):73-75.
- [70]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.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:第5卷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6.
- [71] 陈佩芬.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:西周篇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- [72] 黄锦前. 从考史簠谈殷墟甲骨文“𠂔”的地望[J]. 殷都学刊,2017(3):1-3.
- [73] 李启良. 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簠[J]. 考古与文物,1989(3):7-9.
- [74] 徐天进. 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[J]. 文物,1998(5):85-87.
- [75] 湖北省博物馆. 晋国宝藏——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12.

责任编辑 张颖超

网 址: <http://xbbjb.swu.edu.cn>